

中华文明



史



秦汉



中华文明史



第三卷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中华文明史

第三卷(秦汉)

顾问/周谷城

总监纂/乔卫平

本卷总纂/唐赞功

责任编辑/李自修 韩新保

封面设计/张志伟

印刷/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本/850×1168 1/16

印张/47.25 字数/1,011 千字

彩页/12 页

版次/199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/1999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/5,001—10,000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石家庄市城乡街 76 号)

ISBN 7-5434-1186-5/K·32

定价:85.00 元

前言

多年来，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同仁，一直希望看到一部直接表现“中华文明”主题的大型学术著述问世。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，决非一二人力所能及。学界虽不乏良史之才，然而见仁见智难臻一体。欲将横贯九州方夷、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灿然著在简册，克备一家之史，实非易事。因此，这一选题一直无人问津。大型学术著作《中华文明史》的问世，正是试图弥补这一空白，实现海内外学者多年的宿愿。

中华文明彪炳寰宇，震烁古今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。但如何表述中华文明这一历史主题，在中国学术界仍是一个新的题目。如果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中华文明，可以不去深究“文明”自身组合的要素及其相关性的联系，但作为一部专门表述中华文明这一历史主题的著作，则必须予以一一说明。

首先，“中华文明”是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、主体脉络及其总体水平，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范畴，以及二者兼有的自然生存环境。其次，《中华文明史》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，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，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。此外，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，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。譬如：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，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，战争的理论、艺术、手段等等，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；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，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、融合的过程中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类似的现象，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。必须指出，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，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，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。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不同的文化区域，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，以至进入 20 世纪以后，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，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。因此，我们把某些少数民族的区域性文化，作为中华文明的边缘性文化或分支。至于史前新石器时代的

2 中华文明史

考古区系文化，虽不能划入严格的“文明”概念之中，仍应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加以探求。上述诸点，是本书表述中华文明这一主题时所遵循的原则。

在学术界，如何把握和概括中华文明的总体特征，始终是一个难题。它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化自身，而且涉及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，因而极其复杂。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，在史前和先秦时期，多元的区域性文化的色彩非常鲜明，这一特征与诸多历史因素相作用，促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。其后，以秦代大一统的中央帝国为开端，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，才逐步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。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，这种趋同性都是十分明显的。西汉以降，儒学在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，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平等竞争的机会大大减少了，社会思想领域相对沉寂，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。但是，具有多元性文化特色的作品依然不绝于世，并在文化领域里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。宗教、哲学、文化艺术领域中非儒学化的现象，也是始终存在的。毫无疑问，由于数千年中外文化的交流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和融合等等因素，汉族文化从周边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营养，因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，而非原初相对单一的性状。今天的中华文明正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地、各民族文化汇合而成的滔滔大河。

就总体而言，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较为清晰，而且几乎每朝每代都有明显的兴衰更替之迹。中国古代的修史家，也一向注重总结先朝的治乱得失，以为时人明鉴。除此大端之外，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身形成、发展、衰落的规律及特征，它们虽然受到社会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和制约，但并不都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同步。这就造成了在社会历史总体兴衰过程之外的广义文化领域中，呈现多重起伏交错的状态。客观描述这一历史状态，并探求形成这一状态的原因，是本书既定的写作宗旨。本书的另一宗旨，是力图全面、系统地发掘整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，概括和反映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；同时又要正确对待中华文明的得失长短，既不盲目拔高，也不无端贬抑，以实事求是为宗。

编纂大型的中国历史著作，还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。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。史学界为此而长期聚讼不已。为了突出文明的主题，本书采取淡化分期纠纷的原则。一方面，用一定的模糊性，粗线条地勾画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，而不囿于特定的阶级集团斗争及“五种社会形态”的成说。另一方面，采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说法，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：1. 原始社会：史前时期；2. 古代社会：夏商周三代。其中，春秋战国时期为古代社会

向中世纪社会过渡的时期；3. 中世纪社会：以秦统一六国、建立大一统帝制国家为开端，至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政体为终止；4. 近代社会：以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政体为开端。

其次是对于历史人物的处理。本书不为历史人物单独立传，而是把他们放到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中去叙述。以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为本位，个人生平为依从。

再次，史书内容的交叉与互见，也向为学界争议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往往同为一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因而被一些学者诋为所短。但也有学者认为，《史记》叙事前后屡出，纪传互见，可增加读者接触历史事件的机会，并从多种角度和场合表述同一历史事件，可以使人产生对于历史的立体感受。多层次、多角度地描述和剖析同一历史现象，也是本书既定的写作宗旨。其目的在于，阐发同一历史现象中所蕴含的不同文化要素，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综合理解。

在确定直接表述“中华文明”这一历史主题之后，以何种体例将众多文化现象组合在同一主题形式之中，并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，我们既不能率由旧章，又要充分取鉴前人著史之长。本书参考通史惯例，按历史朝代的自然顺序划分卷数。全书共分十卷，分别为：第一卷：史前时期；第二卷：先秦时期；第三卷：秦汉时期；第四卷：魏晋南北朝时期；第五卷：隋唐时期；第六卷：宋辽金时期；第七卷：元代；第八卷：明代；第九卷：清代前期；第十卷：清代后期。各卷的章目设计，力图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题，并尽量反映不同文化类型在同一时期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。当然，本书所设二十余个学科文化，也只能是求其大要，不可能囊括一切。

《中华文明史》是集体协作的成果。在编纂过程中，百余名专家和学者，跨越数十个专业学科领域，坦诚相待，通力合作，实乃我国学术界之盛举。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政法大学、中央民族学院、中国中医研究院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、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、北京画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、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军事科学院、中国历史博物馆、北京体育学院、苏州大学、北京图书馆等数十个院校系所。

本书作为海内外第一部大型的中华文明史专著，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，史学界、出版界、新闻界的许多人士为本书的编纂工

4 中华文明史

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著名学者周谷城、季羨林、张岱年诸教授为本书题写贺辞，在此，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由于本书规模较大，涉及内容广泛，而编纂时间又比较短促，纰缪或意有未逮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望大方之家，不吝赐教。

《中华文明史》编纂工作委员会（乔卫平执笔）

1989年4月

卷首语

本书叙述的是秦汉时期的文明史。包括秦朝（公元前 221—前 207 年）、西汉（公元前 202—公元 9 年）、东汉（公元 25—220 年）诸朝，自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220 年，共经历了 441 年。东汉献帝元年（公元 196 年）以后，汉室名存实亡，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。

秦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先秦文明的基础上，秦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，并对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中国以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闻名于世，是从秦汉开始的。

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，是秦汉文明发展的突出特点。政治大一统，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。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趋势，“并海内，兼诸侯”，废分封，立郡县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。自秦以后，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。秦始皇的统一，对中华文明是有大贡献的。但是，秦朝二世而亡，巩固统一的任务是由汉朝完成的。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。在他统治的半个世纪中，“外事四夷，内兴功利”，进一步扩大了版图，发展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秦皇汉武，成了大一统的象征。

秦汉的统一，是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。在多民族中，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，在这个时期形成。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。秦的统一，给华夏族注入了新的血液，为华夏族向汉族的转化创造了条件。至汉代，华夏族获得了稳定的发展，完成了向汉族的转化。与此同时，在汉族周围的其他民族，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，有的民族，如匈奴、羌、越等族，仍活跃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。在统一国家中，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相互联系、相互依存，各民族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，共同造就了秦汉大一统文明。

秦汉的统一，是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的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制度。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并通过郡县制、官制、法制、军制等，把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，以巩固国家的统一。统一、专制、集权三者的结合，强化了封建国家的职能。一方面，封建国家集中全国的人力、物力，形成强大的国力，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，使国家的社会职能较充分发挥；另一方面，封建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，强化了国家的阶级职能。秦汉时期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的盛衰消长，都同国家职能的发挥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秦汉时期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即陈胜、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，西汉末的赤眉、绿林起义，东汉末的黄巾起义。农民起义推翻或摧毁了旧王朝，打击了封建统治，为社会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统一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，而秦汉的统一，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秦汉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，就是在长期统一和安定的局面下创造出来的。

封建土地所有制支配下的小农经济，是秦汉政治大一统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。国家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措施，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。封建生产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的树立和发展，农业生产地区的扩大，形成以农业为主的统一经济地区。西汉末年，全国耕地面积 827 万余顷，人口 5959 万余人，这是秦汉王朝在经济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。但是，由于统一国家地域辽阔，地理条件复杂，各地区存在着差异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。然而，各地所出“皆中国人民所喜好”，以黄河流域农业发达地区为中心的全国性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。这种经济上的多样性的统一，以及由此而自然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成为维系秦汉政治大一统的纽带。

秦汉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一时期，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创新，如铁犁的改进，耒车等新型农具的使用，代田法和区田法的推行，木结构建设技术的兴起，炒钢技术和造纸术的发明，等等，反映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趋于成熟；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，如氾胜之的农书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和《灵宪》，以及《九章算术》等著作，标志着古代农学、医学、天文学、算学等学科体系的形成。科学技术的进步，生产力的发展，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。

秦汉政治、经济的统一，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统一。自秦始皇至汉武帝，封建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统一进行了不断的探索。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，汉初崇尚黄老思想，各有其成败得失。汉武帝时，适应加强和巩固大一统的需要，董仲舒综合先秦各家思想，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和阐发，创立了神学化的新儒学体系。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把儒学确立为封建统治思想。从此，儒学被立为官学，逐渐影响和支配了思想文化领域，并成为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主流。

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，带来了文化的昌盛。一是促进了各地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，如楚文化的楚辞、楚舞、楚声，边境各族的音乐、舞蹈艺术，传布到中原地区，给汉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注入蓬勃的生机，汉代的文学艺术就是在中原文化、楚文化以及各族文化共同滋养下成长起来的。二是造就了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，产生了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班固的《汉书》为代表的史学巨著、以汉赋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一代文学。前者奠定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，后者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三是统一国家的文化建设，如统一文字，兴建学校，搜集与整理图书，以及乐府民歌的采集与配乐等，都大大推进了文化、教育的发展。当然，大一统也给思想文化带来消极影响，特别是儒学

的独尊和繁琐的经学，对思想文化起了某种禁锢作用。

秦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封建大国，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处于领先地位。适应文明进步的需要，秦汉王朝积极发展同域外各国的关系。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，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，揭开了中外文化交往新时代的序幕。秦汉王朝与今中亚、西亚、南亚、东南亚、东北亚，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，建立了联系，中外使者往来，商人贸易，“相望于道”。中国的丝绸、铁器、生产技术、文化典籍等，传播到域外各国；域外各国的物产、文化艺术以及佛教和佛教文化等，传入中国。中外文化的交流，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。秦汉文明由于大量地吸收外来文化，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并呈现出恢宏博大的气势。

秦汉大一统文明，是本卷着力表现的主题。但是，大一统的秦汉文明，是极其丰富和十分复杂的。它经历了兴衰更替，包含着治乱得失；它优劣长短并存，既有巨大成就，又有诸多弊端；它是多样性的大一统，在各个领域中既有明显的趋同性，又存在着种种差异。因此，全面地反映秦汉大一统文明的面貌，是一件困难的学术工作。本卷力图概括和反映各学科研究的成果，从不同角度和层次，全面地描述秦汉文明的主题。但由于分学科撰写，在全面把握和取舍褒贬上，难于完全一致；笔法文风的不同，亦难于完全避免。全面揭示秦汉文明史的面貌，还要我们继续作出努力。

参加本卷最后阶段统审定稿的学者有：张安奇、陈绍棣、彭林、高寿仙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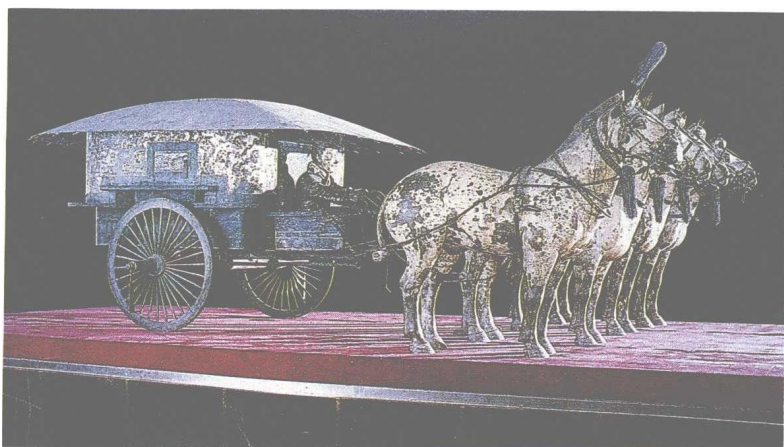
铜车马

秦

高 104、长 328 厘米。重约 1200 千克

各部位均仿照真车、马制造，结构完整，鞅挽具齐全，图案装饰华丽。车舆（厢）分前后两室，前室是御官驾驭处，后室为主人坐卧之席，这种车称为“安车”。

1980 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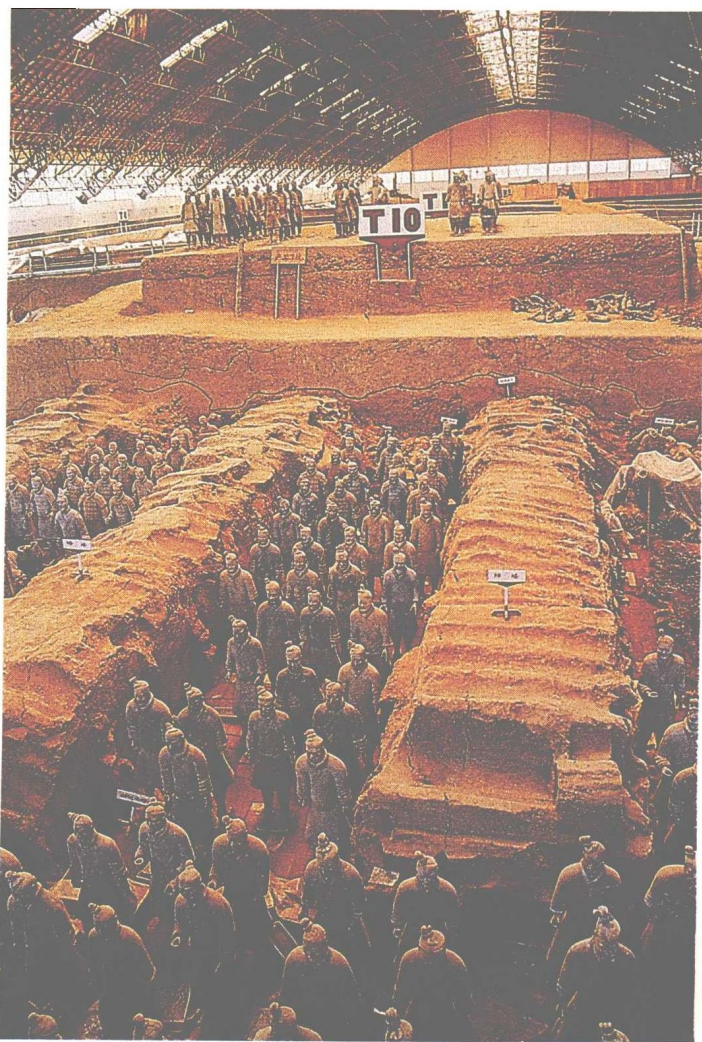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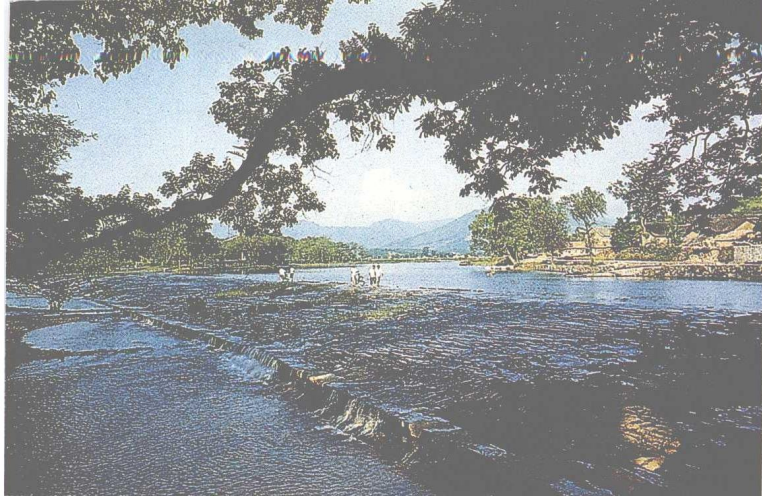
兵马俑坑

秦

此为一号坑军阵

1974 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出土





灵 渠

全长 34 千米

秦代著名水利工程，历代屡有
修建

在广西兴安县境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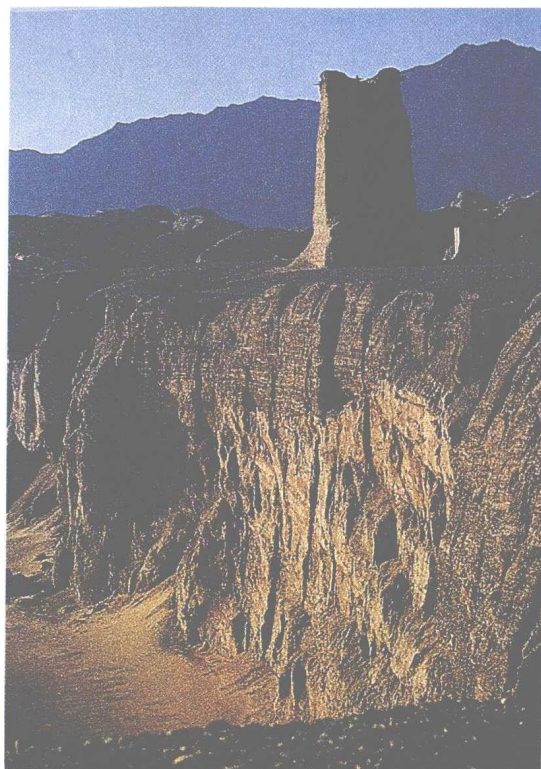
克孜尔尕哈烽燧

汉

残高约 15 米

丝绸之路北道上时间最
早、保存最好的一处烽燧遗
址

在新疆库车县城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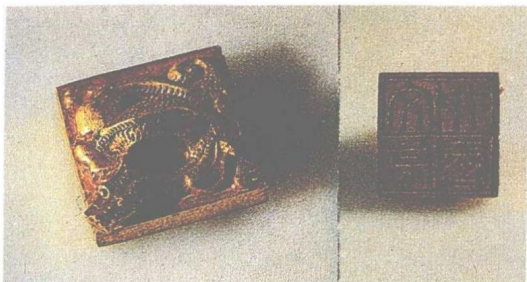


黄肠题凑

西汉

用 15000 多根长 90、宽厚各
10 厘米的柏木椽叠垒而成，高达
3 米，直抵墓室顶部，其内部空间
分为前、后室和内回廊，棺槨置
于后室中部。

1974—1975 年北京丰台大
葆台一号墓出土



“文帝行玺”金印

西汉

高 1.8、边长 3.1 厘米

此印为第二代南越王所佩，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纽印。

1983 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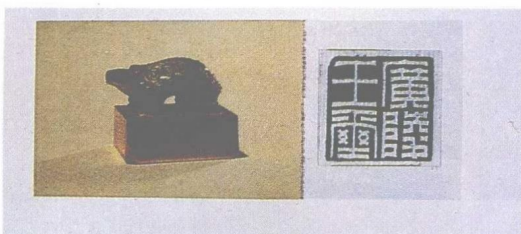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皇后之玺”玉印

西汉

高 2、边长 2.8 厘米

1968 年陕西咸阳出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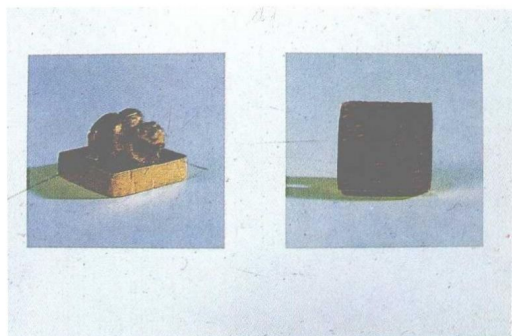
“广陵王玺”金印

东汉

高 2.2、边长 2.3 厘米

形制、质地均与文献所记王印同，是东汉早期官印的标准品。

1981 年江苏邗江甘泉镇出土



“滇王之印”金印

西汉

高 1.8、边长 2.3 厘米

与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的汉武帝元封 2 年“赐滇王印”相符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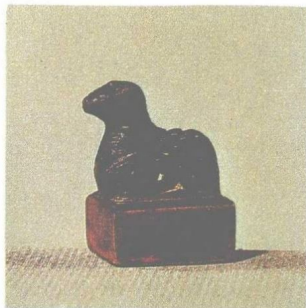
1956 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

“汉归义羌长”铜印

西汉

高 3.5、边长 2.3 厘米

1953 年新疆新和乌什喀特古城遗址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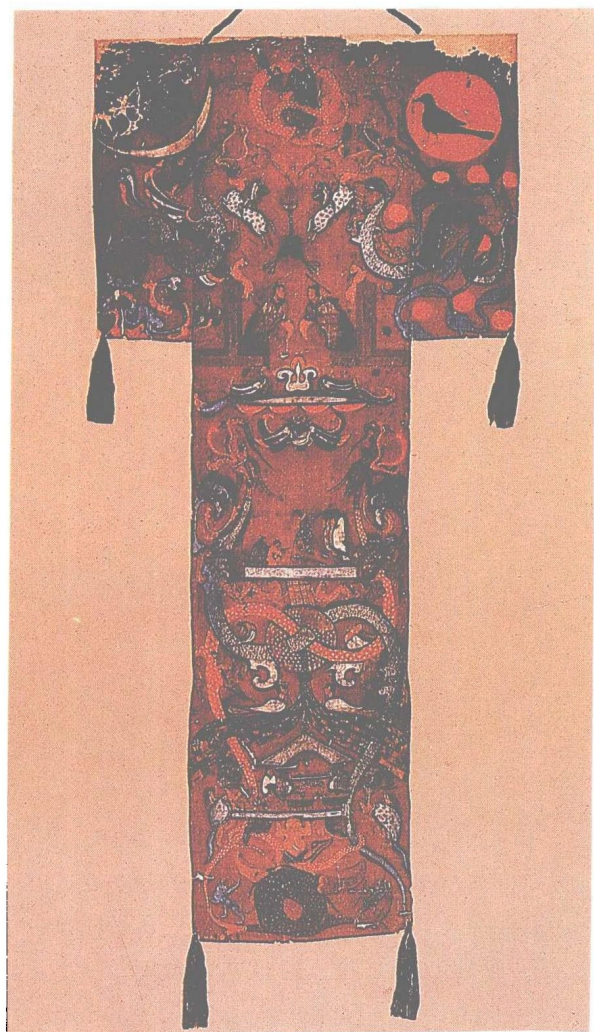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汉倭奴国王”金印

东汉

高 2.2、边长 2.3 厘米

1784 年日本福岡志贺岛出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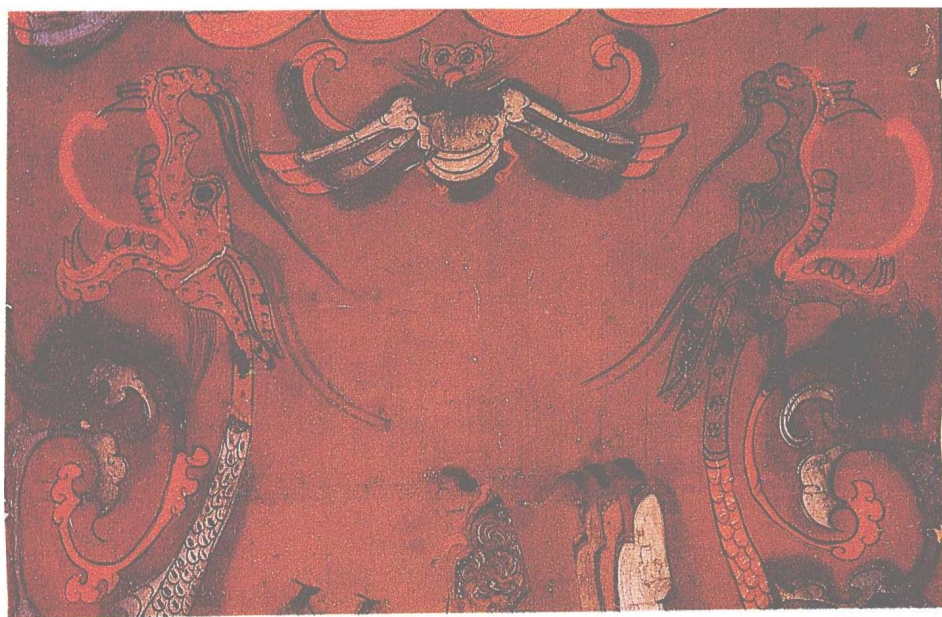
帛 画

西汉

长 205、上宽 92、下宽
47.7 厘米

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
堆一号墓出土

(孙克让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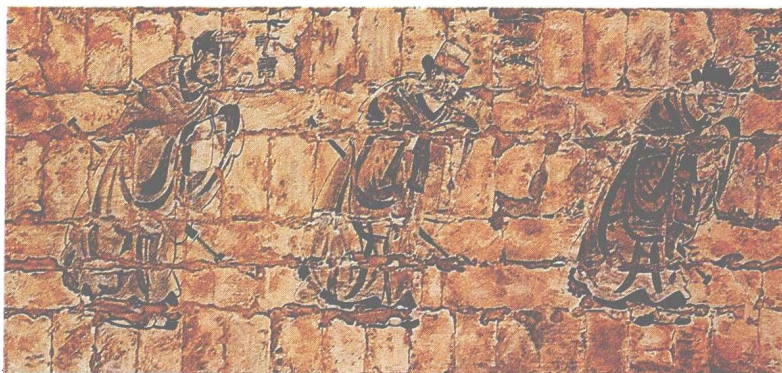
帛
画
局
部

官吏图

东汉

纵 89、长 254 厘米

1952 年河北望都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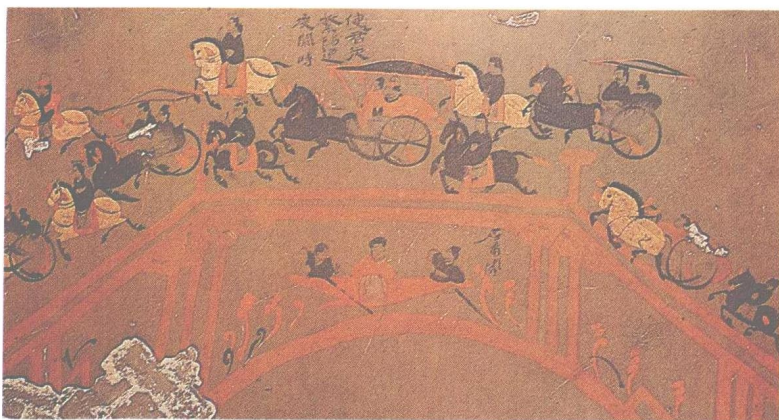


居庸关图

东汉

纵 68、长 133 厘米

1972 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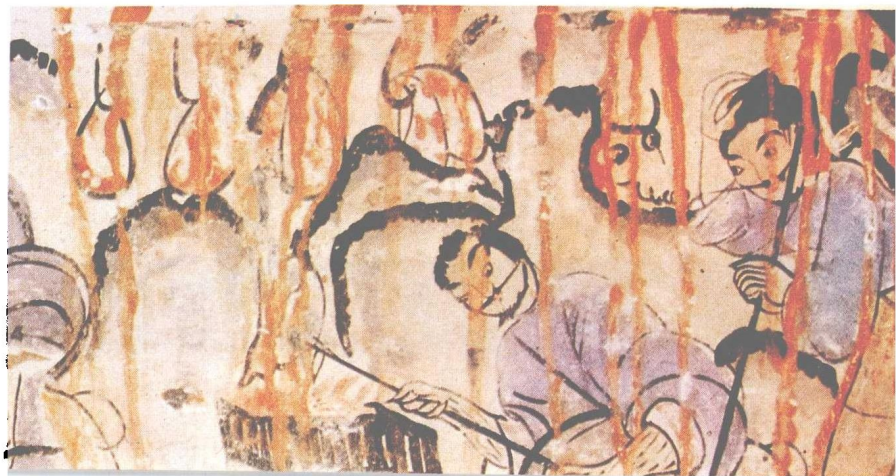


宴饮图

西汉

纵 23、宽 193 厘米

1957 年河南洛阳出土





素纱禅衣

西汉

身長 128、右袖口到左袖口长
190 厘米

薄如蝉翼，重量仅有 49 克。

1972 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
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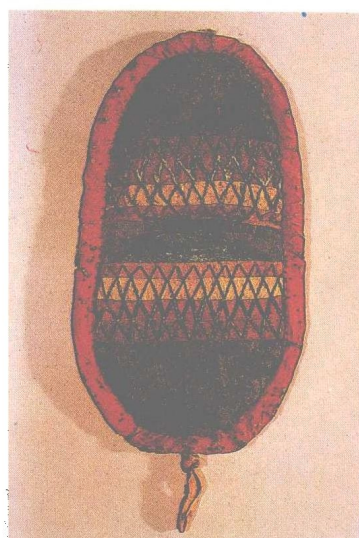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信期绣”绢手套

西汉

长 24.8 厘米

1972 年长沙马王堆一
号墓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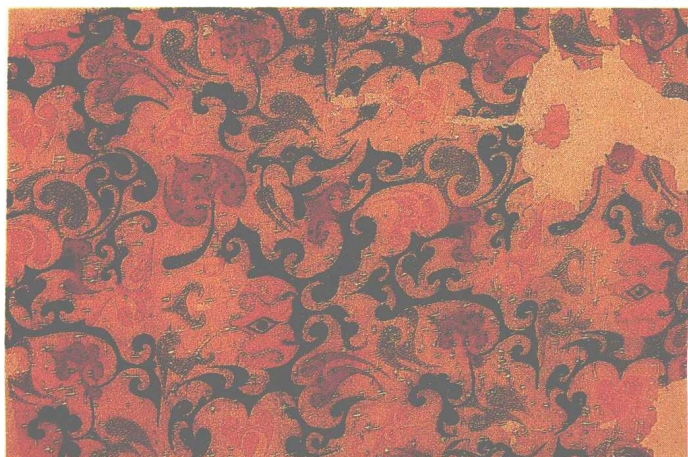


綦纹锦袋

汉

长 20、宽 10.7 厘米

1984 年新疆洛浦县赛
依瓦克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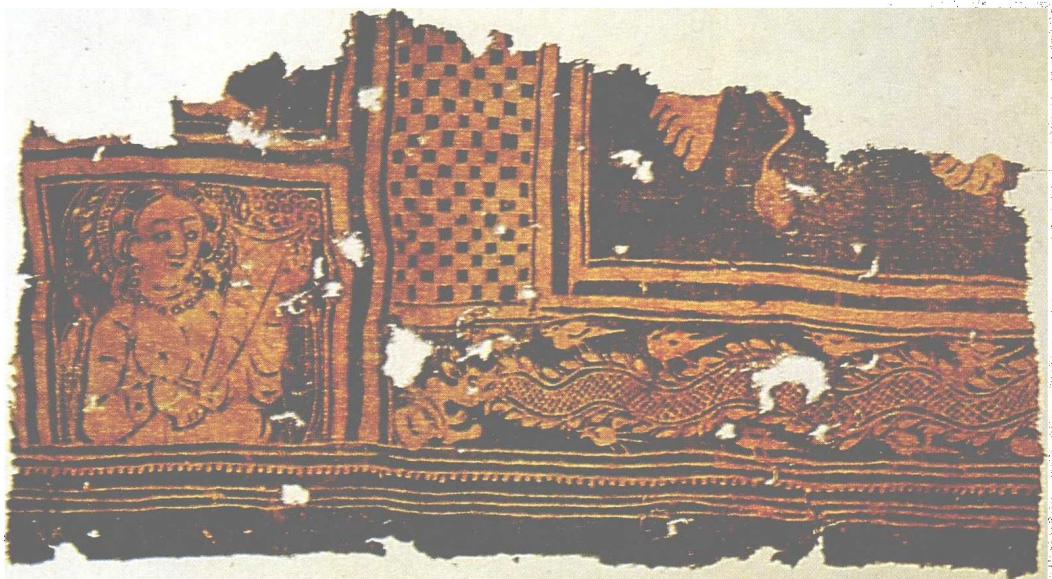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乘云绣”绮

西汉

长 50、宽 40.5 厘米

1972 年长沙马王堆一
号墓出土



蜡染棉布

东汉

残长 86、宽 45 厘米

目前已知最早的以种植木棉为原料的棉织

品

1959 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



树叶纹栽绒毛毯

汉

长 76、宽 73 厘米

1984 年新疆洛浦县赛依瓦克出土